

西游记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

西游记研究

——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西 游 记 研 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200,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册

书号: 11354·003

定价: 0.85 元

责任编辑 陆国斌

编 者 的 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象春风一样吹遍神州大地，社会主义祖国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同样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兴旺景象。在新形势的鼓舞下，来自全国各地的《西游记》研究者，于一九八二年十月间，聚集在江苏淮安——连云港，举行了《西游记》学术讨论会。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探讨我国这部文学名著的思想倾向、艺术成就、版本源流及其作者吴承恩生平、思想方面的有关问题。

这本集子就是从提交大会的论文中选编而成的。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它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曾经产生过并且继续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对于这部作品的研究工作，至今仍还比较薄弱。这本集子的选编，不仅为这次建国以来的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留下历史的记录，更重要的是为今后研究《西游记》者提供了一些资料。可以预期，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对《西游记》的探讨和研究，也将逐步深入，并取得更大的成绩。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西游记》思想倾向琐议

——兼谈评价《西游记》的方法赵明政(1)

《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何满子(11)

《西游记》与社会现实李希凡(22)

《西游记》对明世宗的隐寓批判和嘲讽苏 兴(33)

《西游记》的玩世主义和现实精神欧阳健(54)

论《西游记》的美学价值和宗教观念的关系问题吴圣昔(72)

取经路上的孙悟空

——再论《西游记》的思想政治倾向朱其铠(89)

论《西游记》塑造人物的艺术特色刘毓忱(101)

论《西游记》的幻想艺术刘烈茂(114)

风云谲诡 神与物游

——略论《西游记》奇特的艺术构思郑云波(127)

《西游记》和童话金燕玉(137)

《取经诗话》阅读札记高明阁(149)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李时人(169)

《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陈 新(190)

吴承恩的“荆府纪善之补”和《西游记》的写作

刊刻.....陈 澈(206)

吴承恩墓地调查散记刘怀玉(215)

附录:

近几年的《西游记》研究综述刘耿大(223)

《西游记》在国外王丽娜(255)

《西游记》研究论著目录刘耿大 王丽娜(271)

《西游记》思想倾向琐议

——兼谈评价《西游记》的方法

赵明政

《西游记》是一部历来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文学名著。对于这部作品的思想倾向，近年来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见解，分歧颇大。有的同志认为，《西游记》不仅是“艺术化的‘心学’”，而且“远远超出了一般‘劝善书’的意义，使这部作品成了一部企图瓦解农民起义的政治小说”；甚至得出“无论就思想内容来说，还是就艺术成就来说，《西游记》都很难说是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之一”^①的结论，加以全盘否定。笔者则认为，尽管《西游记》内容庞杂，甚至有模糊与混乱之处，但是从主要倾向来说，仍然不失为我国小说史上有数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分歧的主要之点在于：如何看待《西游记》这种“神魔小说”，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评价古代作品，以及如何从文学作品这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的审美特征，去评价《西游记》这样内容复杂的古典小说。

一

《西游记》被鲁迅确切地称为“神魔小说”，而不是“神话小说”。他说：“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亦然。只是中国并无含有神话的大著作。”^②他是把“神魔小说”与“神话小说”区分开来的。

神魔小说作为明代小说的“两大主潮”之一，其内容大都“统于二元”，“谓之神魔”，而《西游记》也确实是从神魔斗争演化开来的。这类小说的特点，在于“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③。这一特点表现在《西游记》里，“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④。因此，分析《西游记》的思想倾向，首先必须从神魔小说的特点出发。

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既根据原有取经故事的间架，又“出于游戏”，具有一般神魔小说的特点，“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道释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糊的彼此之争”^⑤。吴承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铺陈那些神魔、佛道故事时，能巧妙地“取当时世态”加以讽刺抨击，涂上现实的色彩，倾注强烈的爱憎。即以唐僧来说，他似乎是一个“一心向善”、“劝人为善”的“圣僧”，而实际上，他是一个迂腐的“烂好人”，“外好里丫槎”的“没骨脊的和尚”，处处显出“脓包形”。他对佛教教义恪守到愚顽的地步，在凶恶的妖魔面前，还念叨“以慈善为本”、“念念不忘善心”，鼓吹“微生不损”，几次险遭丧命。唐僧这个形象，明显反映了作者对佛教的嘲弄，可见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劝善书”是站不住脚的。天宫诸神和西方诸佛，也是作者“讽刺揶揄”的对象。“雷音”是庄严神圣的佛教胜地，可是如来等“通同作弊”，对唐僧四众捐财勒索，毫无善行；连唐僧也惊呼：“这个极乐世界，也有凶魔欺害哩！”总之，笼统地认为神佛是“正”，断定小说旨在“劝善”，并不符合小说的实际。

吴承恩借神魔斗争的故事针砭时弊，往往以“游戏”之笔，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正如鲁迅所说，作者把原有取经故事经

过“翻案挪移”，“几乎改观”，因而对小说的寓意要“随宜附会”，作具体分析。作者既不按“正”“邪”的抽象概念来塑造形象，也不按“正”“邪”的抽象标准来安排情节。孙悟空身上有“妖精气”，但并不妨碍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个令人喜爱的英雄形象。他口头上表示“改邪归正”、“悔过自新”，但实际上仍然对神佛敢于亵渎，甚至当面斥责、嘲讽。如果把《西游记》的思想倾向仅仅归结为孙悟空等人“归圣成真”、“改邪归正”，恰恰是忽视了神魔小说的特点，以及《西游记》“每杂解颐之言”，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讽刺手法。

总之，如果无视神魔小说的特点，笼统地划分“正”“邪”，把小说中的神魔故事，与十六世纪明朝的社会现象一一对照指实，或者用阶级斗争的一般概念去硬套小说的具体情节，都可能会得出不恰当的结论。

二

象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的作者一样，《西游记》作者的世界观也不可能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从根本上说，吴承恩作为封建时代的儒生，他的创作也只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评价《西游记》，首先应当从具体的历史范围出发，分析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有何进步意义，从而给予一定的地位；进而指出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及今天所具有的认识价值。有的同志正是离开了一定的时空范围，用我们对今天文艺作品的标准和尺度去衡量《西游记》，把《西游记》复杂的内容单一化，以“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为理由加以全盘否定，甚至用阶级斗争的观念硬套吴承恩的创作动机。

恩格斯说：“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⑥分析《西游记》的思想倾向，用解“一次方程式”的方法，是不可能反映这部作品的真实面貌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朽的封建王朝之一，而吴承恩所在的嘉靖、万历年间，最高统治者更是出名的昏君。吴承恩对现实不满，以幻想形式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确实是站在维护封建正统的立场上，意在匡国正君。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当时的黑暗现实揭露得淋漓尽致，对权奸佞臣的丑恶面貌刻画得入木三分，却正是《西游记》的价值所在，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思想意义。

具体说来，《西游记》积极的、进步的思想意义在于：第一，对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昏乱，加以讽刺、抨击。如九个人间国度，大都是“昏君”执政，奸佞当道，民不聊生，作者通过孙悟空之口加以痛斥。那些形形色色的妖魔，绝大多数是残害百姓的邪恶势力。作者还以妖魔比附奸佞，充当“国丈”、“国师”荼毒百姓，明显反映了作者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第二，全书充满了对佛道的批判。作者揭露佛教寺院搜刮民财、上层僧侣“游手游食”所造成的灾难，批判佛教教义的虚伪性。针对当时最高统治者“崇道”，小说揭露道教的罪恶，更是尖锐、深刻。第三，主张实行“清明”政治，除暴安良，安定社会，以苏“小民之困”。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第四，作者塑造了孙悟空这一光辉形象，表现了他在大闹天宫时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在诛灭妖魔时爱憎分明的态度和驱奸除佞的政治主张，在向大自然斗争中的坚韧不拔的意志。这一切，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达到了作者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特别要指出的是，尽管孙悟空形象中掺杂了作者阶级印记的某些消极成分，但是，孙悟空形象所体现的顽强斗志和事业心，他的机智、乐观、勇敢和必胜的信心，他的丰富的斗争经验（如三打白骨精等等），已成为我们民族顽强进取精神的象征，至今还有着教育意义。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古代作品，不能离开一定的时空范围。否则，就必然会抹杀作者和前人相比所提供的那些新东西。而用一般的阶级概念去硬套古代作品，用解“一次方程式”的办法，“一刀切”、“一边倒”地加以“批判”，一笔勾销一部优秀的古代作品，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三

分析古代作品的思想倾向，不但要从作者的直接议论和整个构思来考察，而且要从主要人物形象、基本情节，特别是要从情节和场面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意义来考察。

《西游记》同一切优秀的古代作品一样，作者认识生活的指导思想（即作者的立场、观点）和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倾向，这两者虽有联系，但内涵却有所不同。形象大于思想，是一切过去时代的优秀作品的普遍现象。恩格斯在谈到作品的倾向性时，是这样要求作家的：“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⑦ 我们也可以说，分析《西游记》这样的古代作品，虽然要顾及作者“直接说出”的议论，即那些诗词、曲调、偈语等韵文，但是更应从占全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情节和场面本身流露出来的思想意义作出评价。恩格斯

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是这样评价的。他说,“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作品中倾注了对贵族的无限同情和对旧制度的留恋,但是“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⑧。列宁在谈到列·尼·托尔斯泰时,指出了他在作品中贯穿了反动的说教,同时又认为他的作品表现了“广大群众的情绪,描绘他们的境况,表现他们自发的反抗和愤怒的情感”,是人民群众“永远珍视和阅读的艺术作品”^⑨。笔者认为,恩格斯、列宁的这种辩证分析方法,也是我们分析《西游记》思想倾向的指南。

诚然,《西游记》中大量的诗词、曲调、偈语和一些议论,反映出作者拥护“明君”,维护封建正统的思想。但是,这些韵文和议论往往与情节、场面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倾向相矛盾。而这种矛盾,恰恰象列宁所指出的列·尼·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反动说教和具体情节、场面中所固有的思想意义相矛盾一样。当吴承恩通过神魔斗争这种虚幻形式反映现实时,笔触涉及到现实中丑恶的东西,他的不满现实、愤世嫉俗的那部分思想反映在具体情节中,就形成了作品的客观意义。比如在乌鸡国、车迟国、比丘国,作者意在要求封建帝王“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而在具体描写中,却以妖邪比附奸臣,进女色,制丹药,蒙蔽昏君,弄权术陷害忠良,耍阴谋祸国殃民。这一切,不仅有生动的情节、逼真的细节描写,而且倾注了作者强烈的感情,有着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和认识价值。我们当然不能因作者提出了“皇图永固”,让无道昏君变成有道明君,而一笔抹杀。再如,前七回孙悟空“操兵造反”、龙宫借宝、大闹天宫等情节,作者描写孙悟空藐视天宫、

龙宫、阎王的英雄气概，让神佛处于狼狈的境地，威风扫地以尽，在具体情节中流露出鲜明的爱憎。但也有针对孙悟空的“些些狂妄天加谴”、“欺天诳上名声坏”、“恶贯满盈今有报”等韵语议论。有的同志不仅把这些韵语看成作者“大骂”、“拍手称快”、“满心欢喜地诅咒”，而且回避作者热情赞美孙悟空、讽刺揶揄神佛的具体描写。其结果，必然会贬低或否定孙悟空的形象。

议论和具体描写相矛盾，作家的主观思想和作品中情节、场面所流露出来的客观意义相矛盾，在我国古代优秀作品中不乏其例。学者公认，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许多优秀作品的基本思想倾向是进步的，但这些作品的篇末，作为作者最后点题的“异史氏曰”就充满封建伦理纲常的说教。当然，我们不能根据“异史氏曰”点出的题旨来评价这些优秀之作。同样，我们评价《西游记》的思想倾向，也不能仅仅摘引小说中的片言只语，或简单地从孙悟空大闹天宫到“皈依”佛教的取经故事间架上加以推理。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的审美特征，要求我们在评价《西游记》的思想意义时，应当从具体的情节和场面中流露出来的思想、从具体环境中的神魔形象的具体特征，去分析这些情节和神魔形象的不同寓意。在此基础上，结合作者认识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立场、观点）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得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四

全盘否定《西游记》的同志，往往要提到鲁迅引用明代谢

肇瀚关于《西游记》主旨的一段话：

《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猴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服，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

必须指出：第一，鲁迅是不完全同意谢肇瀚这段话的。他说“假欲勉求大旨”，可见是勉从此说的。第二，鲁迅对《西游记》的思想意义，作了精辟的全面论述。他看出这部作品“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而且把原有的取经故事“翻案挪移”而具有“几乎改观”的寓意；作者对神魔的态度，则是“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即是神佛和妖魔都通人情世故，反映了人情世态。第三，鲁迅又引用《西游记》十三回“作者所说”，对谢肇瀚的话加以补充：

众僧们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缘由……三藏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说下誓愿，不由我不尽此心，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皇图永固。”

鲁迅所引“作者所说”这段话，所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是对《西游记》“大旨”的又一极为重要的补充。“取经的缘由”原是针对现实社会的邪恶，即“多贪多杀，多淫多诞，多欺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类。而小说中那些使“朝廷失政”的“十分昏乱”的昏君，“贪欢爱美”，“淫妖女无道”，企图寻求“千年不老”的“海外秘方”等等，正是作者希望灭掉的“邪思妄念”。荼毒生灵的妖魔，不仅造成“多贪多杀”等种种罪恶，而且使昏君“迷了本性”。只要国君驱奸除佞，做到“重爱黎民”，“文贤武良”，“国泰民安”，就可以“皇图永固，

福寿长臻”。因此，诛灭妖魔，国君“心灭种种魔灭”，就可以成为有道的“明君”。针对当时暗无天日的国政，作者要求出现一个“国泰民安”的局面，在一定的时空范围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有的同志把“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比附为王守仁“心学”中“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并把《西游记》说成“同心学一样”的“瓦解农民起义的政治小说”，显然是不妥的。

吴承恩把“国泰民安”、“文贤武良”的“清明”政治理想，也部分地寄托在孙悟空身上。作者让孙悟空向昏庸无能的玉帝造反，痛斥昏君，诛灭残害百姓的妖魔；作者不让孙悟空最终占了玉帝的宝座，而是戴上“紧箍圈”，“皈依”佛教，帮助无道的昏君变成有道的明君。正是在这两方面的意义上，鲁迅认为谢肇淛的“盖亦求放心之喻”概括了《西游记》的“大旨”。作为十六世纪的一个儒生，吴承恩希望消灭国君和权奸佞臣、贪官污吏造成的“种种”魔乱，也希望使“心猿驯服”而制止魔乱，达到“皇图永固”，这是不足为怪的。

所谓“放心”，就是放纵恣肆之心。“放心之喻”，就是希望“收放心”。不仅孙悟空造反天宫与“皇图永固”不相容，而且昏君“失政”、纵容奸佞恣行妄为也与“皇图永固”不相容。“放心之喻”，主要还是指那些心意放纵的昏君乃至妖魔。从《西游记》的这个“大旨”，可以看出这部杰出作品积极的、进步的思想意义，也明显反映了作者维护封建正统的阶级局限。如果把“收放心”仅仅归结为“扑灭劳动人民的革命意识”，显然不符合作者的本意。

综上所述，《西游记》以“幻想的形式，现实的内容”，曲折地反映了明代中叶的社会现实。从作品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现

实的彻底性和批判的深刻性来说，从作品所展示的瑰玮奇特的艺术境界来说，《西游记》不愧是我国文学史上有数的优秀作品之一。我们只有运用正确的方法去进行分析，才能够得出符合于作品实际的恰如其分的结论。

注释：

①刘远达：《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思想战线》1982年1期。

②⑤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③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⑥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7页。

⑦恩格斯：《致敏·考茨基》，同上，454页。

⑧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同上，463页。

⑨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列宁全集》第16卷，322页。

《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

何 满 子

魏晋以降的文人小说，分成志怪和叙人事的两大流脉。从唐代俗讲衍演而来的市俗小说，就其内容分，也可以区别成两大类：叙述人间故事和叙述超人间故事的。以总的发展趋势言，随着宋元以后小说之日益拥有广泛的群众，随着群众对小说的认识价值日益增高的要求，直接反映人生现象的小说越来越扩大其阵地；超人间现象的描叙渐渐地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神怪的情节成了人间生活的附庸，如《三国演义》中的于吉、左慈故事，《水浒传》中的公孙胜、戴宗的作法，直至《红楼梦》的太虚幻境等等，这种怪异的情节在小说中不占重要的地位；一是仍以超人间的故事为主体，但它成了讽喻体的小说，其性质近于寓言或成人的童话，使怪异的情节中充满着人间生活的色彩，从而取得诗意。《西游记》和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狐鬼故事，便属于这一类。以上两类之外的侈谈神怪的小说，如《封神榜》、《三宝太监西洋记》，以及明清不少志怪的笔记，都因为缺乏生活而显得枯窘，煞费苦心设计出来的惊异情节只显出它荒唐的性质，只有其中某些片段、章节，由于多少包含着现实生活的诗意，才有点吸引力，大部分曲折复杂的情节只是戏剧冲突的抽象图式，只能暂时激起读者的好奇，却不能耐人寻味。稍出色一点的如《封神榜》，它的想象